

CERI

长江教育研究院

Changjiang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教育智库
Thinktanks

2024年05月刊

总第69期

P72 院内动态:

2024 西安·长江教育论坛“教育家精神培育与基础教育强国建设”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 01 在“2024 西安·长江教育论坛”上的致辞 游旭群

院长视点

- 04 2023 中国教育治理研究热点与未来前瞻
19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名家论坛

- 24 新时代基础教育面临的新矛盾 顾明远

专家观点

- 32 以“有组织科研”突破区域教育科研困境
刘大伟 邵静
38 加大问责力度 真正落实教师减负清单 付卫东
41 全球教育话语权塑造：全球教育治理的中国实践
付睿

院内动态

- 58 2024 西安·长江教育论坛“教育家精神培育与基础教育强国建设”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
62 周洪宇院长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全体教职工工作“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辅导报告”
64 我院周洪宇院长受邀参与“八秩荣光强师报国”陕西师范大学 2024 年教育博士生论坛



欢迎与我们互动

在“2024 桂林·长江教育论坛” 上的致辞



游旭群

陕西师范大学校长

尊敬的洪宇院长，各位专家，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在这繁花锦簇、春和景明的美好时节，美丽的陕西师范大学高朋满座、胜友如云，我们非常高兴的迎来了参加“2024 西安·长江教育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在此，我谨代表陕西师范大学，对

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与会的各位领导、专家表示诚挚的欢迎！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陕西师大事业发展和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坐落在古都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是党和国家布局在西部地区的唯一一所教育部直属、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师范类高校，今年，学校迎来了建校 80 周年。在 80 年的办学历程中，从救国、建国到兴国、强国，始终与民族命运起伏共振、与教育事业发展紧密相连，坚守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怀抱教育强国之志，以对国家、民族和教育事业的赤胆忠诚和无私奉献，铸就了“西部红烛精神”，孕育了“两代师表”优秀师生群体，累计培养各类毕业生 50 余万人，为国家和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为西部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学校现有 1 个世界一流学科，3 个 A 类学科，6 个 B+ 学科，4 个国家重点学科，8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形成了“一流的文科、高水平的理工科、特色鲜明的术科”学科格局。特别是近年来，学校改革发展步伐加快，办学活力不断增强，综合实力持续攀升，实现软科中国大学排名七连升，在昨天刚刚发布的 2024 软科中国大学排名中位居第 62 位，取得了新的历史突破。当前，学校正紧紧围绕“教师教育、学科建设两条主线，人才队伍一个根本、教育评价改革这一关键”的“211”总体发展思路，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奋力开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师范大学新征程。

我校的教育学学科，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强劲的学科实力，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目前是 3 个 A 类学科之一，具有 6 位国家级人才、6 位省部级人才，产出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教育学学科建设，将教育学学科纳入“四维驱动”学科布局，作为“7+2”重点建设学科，引进国家级人才李森教授作为部长，学科建设迈入快车道，特别是此次洪宇院长的加盟，必将促使我校教育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长江教育论坛是长江教育研究院打造的精品学术交流平台，旨在聚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教育改革论坛之一。当前，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必须发生变革，不能仅仅满足阐释问题，而要解决现实问题。而解决现实问题是长江教育论坛的显著特色，过往的历次论坛，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教育改革前沿问题，产出一系列高水平学术成果和资政建议，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此次论坛主题是“教育家精神培育和基础教育强国建设”，重点探讨如何弘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提升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水平、推进基础教育强国建设等问题，这一主题着眼服务国家战略、关切教育现实，必将为加快推进我国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基础教育整体水平提供思路、凝聚共识，可以说站位高远、恰逢其时。此次活动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充分体现了学界对我校的高度重视和充分信任。今天参加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都是具有深厚学养、卓越成就的知名专家，在学界具有很高建树，相信此次活动必将是一场难得的思想盛宴和学术大餐，对基础教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最后，衷心祝愿各位专家学者在陕期间工作顺利、身心愉快！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陕西师范大学的发展，为我校“双一流”建设和教育学学科发展问诊把脉，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预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023 中国教育治理研究热点与未来前瞻

来源 | 《现代教育技术》2024 年 05 期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 周洪宇

2023 年，是教育界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的一年。教育治理由此迎来了紧迫、复杂而丰富的研究课题，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经验总结、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也取得了全面进展，推动了教育事业全局发展。基于 2023 年度教育治理研究相关文献的分析，本研究对中国教育治理研究热点进行系统梳理并就未来发展趋势给出前瞻预测，以期为实现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智慧。

一、研究领域：教育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研究以“教育治理”为主题，检索时间设为 2023 年 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

在中国知网检索到 CSSCI (含扩展版) 论文 235 篇, 剔除无关或关联不大的论文, 得到样本文献 191 篇。其中, 基础教育类论文有 35 篇, 高等教育类有 33 篇, 全球教育治理类有 31 篇, 乡村教育治理类有 11 篇, 教师教育治理类有 9 篇, 区域教育治理类、职业教育治理类各 7 篇, 社区教育治理类有 3 篇, 民族教育治理类、民办教育治理类、特殊教育治理类各 1 篇, 剩余 52 篇为综合类论文。虽然分类标准难以统一, 简要的数字判断也无法衡量研究的价值, 但可据此推断出基础教育治理、高等教育治理、教师教育治理、全球教育治理是 2023 年教育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

1. 落实基础教育基点作用, 深化基础教育治理

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基点, 在教育事业发展全局中面向群体最多、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 具有不同于其他类型教育的独特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建设教育强国, 基点在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 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从某种意义上说, 基础教育治理是破除基础教育“改革阻滞”、纾解“有改革而无改进”现象、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路径。基于教育公平理想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治理, 以“双减”促进基础教育深刻变革, 是基础教育治理研究的主线。

基础教育治理服务于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 支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目的是唤醒和保持学校发展活力, 实现学校提升、教师发展、学生成长。基础教育治理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基于教育公平理想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治理。**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化建设事关义务教育质量提升, 事关国家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这就要求“管理退后、教育向前”, 推进多元共治与学生自治相结合, 发挥班级育人功能。另外, 县中振兴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为此, 必须健全完善各类保障机制, 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补齐县中教育发展短板, 这既是教育公平追求的目标, 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条件。 **加强教育负担治理。**教育负担治理涉及学生负担治理、教师负担治理, 要着重解决基础教育中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 **推进教育集团化办学治理。**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有助于推动教育资源均衡分布、促进教育公平, 但非常考验教育集团的治理能力, 其表现

出的中小学校“大规模化”是基础教育改革深化过程中的发展性问题，而协同理论对于强化集团化办学的内外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基础教育治理研究](#)。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已处于历史高位，以 PISA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为代表的学生评价项目作为治理工具的功利化价值取向和政策取向是否合理，成为了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例如，刘骥等指出 PISA 逻辑下各国趋同与标准化的教育政策脱离了本土实际与需求，不利于学生自由、全面的发展，也会影响各国教育治理主权的独立；但王超提出，有必要借助教育国际排名扩大我国在全球基础教育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2. 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强化高等教育治理

普及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数字化是高等教育发挥龙头作用的重要路径。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制度建设、文化内涵、国际比较等底层治理逻辑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亟需构建](#)。2023 年恰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 40 周年，学界对普及化时代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进行了诸多讨论。普及化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由追赶型国家向引领型国家转变，对高等教育的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如要着力探索新型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健全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优势有待发挥](#)。中国式高等教育制度建设既要坚持党的领导，深化人民至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价值理念，也要有融通古今中外，创新现代性与传统性有机统一、本土化与全球化深度共融的“善治”制度。刘淑华等从研究生教育、“双一流”学科建设的角度探讨了高等教育的制度优势。秦惠民等提出要以制度优化与创新引领民办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支撑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文化基础亟待挖掘](#)。王绽蕊等从建立大学治理准则出发，提出大学治理准则是介于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和大学内部规章制度之间的“软法”。周光礼进一步提出中国特色大学治理准则是源于中国文化和现实需求的高等教育文化基础，要基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寻找建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底层逻辑。[高等教育治理的国际比较研究需要加强](#)。学界普遍认为，推进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国际比较研究视野下进一步规划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思考如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等教育强国。

3. 弘扬教育家精神，注重教师教育治理

2023年，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并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打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组合拳”。当前，教师教育治理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使科学教育成为教育治理研究的重点。高质量的科学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对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至关重要。重构科学教师教育体系，首要任务是加强科学教师教育治理体系建设，形成完备的科学教师教育管理体系和标准体系，使之与科学教师教育学术体系和科学教师职前、职后培养体系相协调。“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部署对教师教育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教育部在《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中提出要从数字资源建设、有组织教师研修、教师管理、教师服务四方面开展教师数字化治理实践，为教师数字化素养提升奠定了制度基础。同时，数字技术的入驻为教师负担治理提供了新的手段，也导致教师负担技术治理的异化，需要关注教师感知、引导技术服务、维护数据正义、回归治理初衷。

加强退休教师治理，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挖掘与发挥广大退休教师的政治优势、专业优势、经验优势，并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营造终身学习的文化氛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4. 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全球教育治理是在全球化、民主化语境下形成的一种创新管理模式，是对普遍教育问题和教育公共事务的“共治”过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如何在世界教育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建成世界重要的教育中心，成为中国教育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要议题。

首先，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努力建设世界重要的教育中心。建成世界重要的教育中心，既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宏伟目标与重要归宿，又是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因而要在借鉴世界教育中心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教育实践，不断提升中国教育的支撑力、贡献力、国际影响力和全球引领力。

其次，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推进全球教育治理走向深入。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既是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应然诉求，也是中国提升全球领导力的方式。袁利平等强调要基于平等互惠、合作共赢、多样延展、协商对话、普惠共生等原则，形塑全球教育治理秩序，建设全球教育治理机制，增强应对全球性教育问题的能力。此外，还要深入开展国际教育援助治理、国际中文教育治理、一带一路教育治理、来华留学教育治理等研究。

再次，开展对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研究。研究者基于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不同主体，开展了美国流动儿童教育治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治理、法国师范教育治理模式、北欧四国高等教育治理、俄罗斯学校数字化评估等国别教育治理研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ISA 治理工具和就业治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治理等国际组织治理研究，以及欧洲高等教育治理模式、非盟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欧盟对东盟高等教育援助项目、欧洲高等教育区等区域性国际联盟治理研究。

二、研究热点：教育治理研究重点的凸显

研究热点是学术研究重点的凸显，反映了学术研究领域关注度较高的焦点问题，把握研究热点有助于解决学术研究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梳理 2023 年教育治理研究相关文献，可知该领域出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治理、以教育数字化开启教育现代化、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治理、“双减”政策落地两周年省思、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教育治理等学术热点。

1.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治理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育体系和教育治理等方面现代性不断彰显的过程，而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包含资源治理、制度治理、组织治理、内容治理、评价治理，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制度逻辑和机制保障。教育治理作为国家、社会、学校、个体通过一定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安排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的过程，对教育现代化影响颇深。全民共建共享是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改革创新是教育现代化的动力源泉。教育政策是教育现代化的落地保障机制，薛二勇等认为建设教育强国必然要求建设高质量的教育政策体系，服务于引导、规范、保障教育强国建设的正确方向、资源配置和推进路径等。张继明从新型举国体制视角出发，认为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实践机制，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本土化创造提供了依循。此外，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排头兵”，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需要建立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共同特征”、具有“胸怀天下”担当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2. 以教育数字化开启教育现代化新征程

数字化教育治理是 2023 年教育治理研究的主要热点，也是技术赋能教育治理的新趋势。数字化教育治理的深入发展，推动了教育治理的整体转型。数字技术嵌入教育治理，是应对时代之变、社会之变、教育之变的战略选择。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包含基于数字化的治理、教育数字化的治理两方面内容，在推动教育治理整体转型的过程中要明确数字化转型转什么、怎么转。戴岭等认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指通过数字技术手段促进教育全要素、全业务、全领域、全流程的系统重构和文化革新，这为教育数字化转型规划了整体图景。同时，应通过均衡教育资源、推进简政放权、坚持依法治教、深化校企合作等治理路径使教育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力求在坚持教育数字化公益属性的同时释放转型活力、提供法制保障、加快创新应用。徐瑾劼等指出，技术重构了教育监测内容、重组了监测流程、拓展了监测结果的应用领域，有助于推进教育评价数字化治理。而技术赋能教育治理的前提是完善技术基础设施，这就需要加强教育新基建。当前，教育新基建存在资金筹集难、资源碎片化、数字教育资源共享程度低等问题，需进行整体性治理，建立整体性治理内嵌的整合机制、协调机制和信任机制。此外，推动宏观的国家教育智慧平台建设、数字教育资源整合、数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学校治理数字化转型，提升师生的数字素养和数字化教育能力，也都是数字化转型亟需研究的问题。

需注意的是，数字化教育治理要警惕“黑箱”效应。“黑箱”通常指人类认识世界时面临的“认知无能”，人类有时无法直接了解技术赋能教育治理过程中

的内在机制，数字化推动教育治理转型同样应加强对技术价值的反思。对此，研究者从国家安全视角出发，关注教育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建设，构建“可信教育人工智能”的基本框架，提出警惕教育数字化治理进程中的技术失控和数字化转型的“科林格里奇困境”，主张开展数字化转型风险防范的教育社会实验等。也有研究从马克思“人与机器”思想出发，为人们化解和治理教育场域中的技术应用所带来的生存性焦虑、操作性焦虑、道德性焦虑提供了思路。

3.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2022年11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 ChatGPT 发布。ChatGPT 一经问世，便因其良好的对话理解和内容生成能力，受到了全球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昭示着技术赋能教育迎来了突破性变革和革命性重塑，也为智能时代教育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提供了方向，成为教育治理研究的热点。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治理的价值审思。数字化教育技术的价值治理能够实现教育目标的意向性与能动性，加深对技术与人类、技术与教育关系问题的思考。周洪宇等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治理具备价值、技术和现实三重逻辑，是教育治理体系臻于至善与教育治理能力有效提升的重大契机。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技术赋能下的教育治理其实暗藏危机。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教育面临数字教育治理风险，可能会加深数字教育鸿沟，引发跨国教育治理难题，为提升教育治理效能、促进教育公平带来了挑战。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治理的生态变革。生成式人工智能催动教育主体的角色转型，指向人机共生的教育追求，使人类教育生态更加复杂。围绕“教师如何应对、学生如何培养、生成式人工智能自身如何创新”等问题，学界开展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再次，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治理的未来转型。教育治理除了要考虑教育教学规律、人的发展规律，还要充分考虑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律，促进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的转型。其中，高等教育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核心阵地，故加强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高等教育的风险治理是推动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战略选择，有助于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

4. “双减”政策落地两周年省思

实施“双减”是我国基础教育治理的关键之一，必将推动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和治理体系的重构。落实“双减”政策，以其为撬动点推进基础教育治理，是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长期任务。时值“双减”政策落地两周年，着眼教育强国建设全局，回顾改革成效，展望教育未来，成为教育治理研究的重点。“双减”政策执行透视基础教育治理成效。就“双减”政策本身而言，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不仅开局良好，而且进展平稳、成效明显，为落实教育个性化、实现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供了契机。就教育治理而言，江宏等指出，“双减”政策落地两周年，实现了基础教育治理从“模糊”走向“清晰”、从“单一”走向“多元”、从“传统”走向“智能”、从“千篇一律”走向“凸显特色”。随着“双减”走向深入，教师负担治理、教育集团内部治理、义务教育学校治理等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双减”治理路径展望教育治理未来图景。一方面，“双减”治理的经验为未来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了行动依据。针对“双减”政策执行的碎片化困境，应以协同共治完善新的社会契约，实现单向度的“抑恶”到超越性的“扬善”的转向。另一方面，跨学科、跨文化的“双减”治理研究为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了多样化建议，拓展了未来基础教育的研究视野。例如，李建龙等基于房地产经济学和教育社会学，揭示了住房财富与影子教育支出的关系，提出“双减”政策“需求侧”和“供给侧”相结合的改革主张；李宇阳等从系统论视角深入探讨“双减”落地后家校社育人生态，提出实现家校社教育耦合的关键在于增强各子系统之间的联系，进而形成新的主体联合系统。

5.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教育治理研究

乡村教育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地位，是关系教育现代化、乡村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问题。从乡村振兴视域出发研究乡村教育治理，正是基于此愿景。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的战略需求决定了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各项内容，也指明了乡村教育治理研究的向度。一是乡村教育治理理念的更新。欧阳修俊等提出要跳出城乡“二元”论争，从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出发，明确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

价值导向。二是乡村教育治理理论的多元。田晓苗等基于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对乡村教育现代化治理进程进行自我反思，以此达到乡村教育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孙杰远等借助阶序理论，阐述了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阶序与因应。三是乡村教育治理方式的变革。数字技术是推动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大数据可以嵌入乡村教育治理全过程，但人工智能存在观念、技术、智能和制度之限。四是乡村教育治理内容的丰富。学界对乡村教育治理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研究，涉及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乡村教师治理、农村学校治理等。 **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赋能乡村振兴**。乡村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是赋能人力资本，应当推动人力资本差序化转化为社会资本，建构更加包容、更好适应、更为自主的乡村教育新体系，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共同富裕。乡村学校治理也得到了学界高度重视，有研究认为乡村学校的问题出在乡村，但治理的向度不只是乡村，应从多个层面构建新时代乡村学校治理体系。此外，乡村地区辍学治理、农村学校联盟治理同样是乡村教育治理的重要内容。

三、研究前沿：教育治理研究热点的深化

研究前沿反映了学术研究的最新趋势，是学术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引领性价值。2023年，学界聚焦教育治理概念厘定、教育治理学科建设、教育法体系化与法典化等研究前沿，对教育治理研究的基本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系统探索，深化了教育治理热点研究，回应了中国教育的时代问题。

1. 教育治理概念厘定

作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话语，“教育治理”一词自本世纪初就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教育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以共治求善治”的过程，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教育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从教育治理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在于整个教育治理系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耦合，因此教育治理现代化作为政治话语促成了教育治理研究的学术自觉。

分析 2023 年纷繁复杂的教育治理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教育治理研究取得了全方位进展，但是学界对教育治理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尚未达成共识。孙绵涛等通过对 2022 年之前教育治理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学界主要从要素、形态、性质三个角度来阐释“教育治理”的含义。归结起来，大多数观点认为教育治理与以往教育管理强调的严格管控完全不同，教育治理指的是平等协调、多元共治等；少部分观点认为教育治理是教育管理的高级形态，强调教育管理的“善治”状态。在此基础上，许航等将“教育治理”定义为：教育治理的主体在法治的基础上，运用控制、统治等管理的方法和平等协调、多元共治等疏导的方法，理顺参与治理各方的关系，调动参与治理各方的积极性，共同完成教育组织目标或任务的一种现象。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的研究团队在国内较早关注教育治理研究，已组织编写、出版了《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全球教育治理研究丛书》《新时代教育治理与教育智库研究丛书》等，团队负责人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教育治理的概念做了明确界定，认为“教育治理是指政府通过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安排，协同社会组织、市场、学校和公民个人等行为主体，运用参与、对话、协商、谈判等形式，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以应对共同面临的时代挑战，达到好的治理效果”。

2. 教育治理学科建设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命题后，教育治理开始以“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话语在教育研究领域演进，并逐渐在教育管理学的研究中占据话语中心位置，甚至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近年来，教育治理研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全面推进，使建设教育治理学科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应然诉求。孙绵涛等指出，教育治理学是由教育治理活动、教育治理体制、教育治理机制和教育治理观念四个范畴所组成的学科体系。李政涛认为，教育治理研究作为跨学科主题，在一定程度上整合和推进了政策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或领域的跨界与融通。谢维和分析了中国教育治理的文化秉性，为建构中国特色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深层次的思考。苏君阳等认为中国教育治理在理论上以中国式科层制理论为主导框架，强调

整体利益、协同合作；在政策上偏向共同体主义；在实践上强调法治、公平、协调与认同，制度、文化和情境是导致中西语境中教育治理理论、政策与实践差异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本研究认为，教育治理学是由教育治理实践、教育治理理论和教育治理制度所构成的学科体系，是由教育学和治理研究交叉而成的一门学科，是教育学的一门新兴学科。教育治理学的学理基础不是管理学，而是治理研究、政治学等，不能简单地将教育治理学与教育管理学区等号。治理研究是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提出而产生的，教育治理学是教育治理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属性、研究定位与研究任务。当前要注重教育治理研究，推动教育治理学学科建设，以服务于国家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学界必须共同努力的方向。

3. 教育法体系化与法典化

推动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升依法治教水平，推动法治观念普及，完善教育改革体制机制。随着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深入，教育法体系化、法典化成为教育治理研究的前沿。

首先，推动教育法治观念成为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教育法治是教育治理的基本原则，是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刘永林等指出，学校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式是指统领学校治理全局的主导性理念及贯穿学校治理全过程的根本性方式，法治成为学校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式是实现善治的必然要求与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既有法治本身的理念价值、规则价值、程序价值和文化价值，又有在学校治理中彰显法治理念、依循法律规则、凸显程序正义、弘扬法治文化的实践价值。

其次，开展教育立法学研究，服务教育法体系化、法典化。在推进教育现代化和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历史进程中，教育法体系化、法典化具备了历史条件，成为教育法治建设新的历史使命。教育法体系化建设不仅要针对具体的教育法律问题开展立法研究，还要针对教育立法本身开展教育立法学研究，即对教育立法

原理、立法制度、立法过程和立法技术进行系统化研究。只有构建系统的教育立法理论，才能为法典化提供顶层设计和底层逻辑。高杭等从教育法法典化的价值导向与治理效能出发，主张借鉴中外法典编纂经验、凝聚教育法学理论体系共识、建设中国特色教育法制体系，提出教育法作为行业法的定位影响着教育法法典化的模式选择，决定了教育法典编纂应当走适度法典化道路。此外，宪法对于我国教育法法典化的推进起着根本性、基础性的指导作用。龚向和等主张通过法释义学来建构教育法法典化的宪法基础，为教育法典编纂工作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源自根本法层面的规范指引。

再次，探索教育法治现代化面临的具体教育法律问题。此类研究成果较多，如从完善终身教育法律体系、推进终身教育法治现代化的角度进行研究；从比较视角出发，探索教育惩戒权的法律规制；提出尽快制定国家教育考试应急法，以落实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依法治教；对《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进行解读，并探讨法律颁布后的实践路径问题等。

近年来，笔者多次撰文呼吁启动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典》。2023年11月24日，笔者在教育部召开的教育法典编纂研讨会上主张教育法典应具备体系性、逻辑严谨性、内容完备性；教育法典编纂则要遵循“五性”，即坚持政治性、注重导向性、把握特殊性、加强研究性、注重实效性；要坚持以民法典编纂为示范，推动成立教育法典编纂工作领导小组和教育法典起草工作专班，落实教育法典编纂工作；同时，要做好三项工作，包括组织开展循序渐进的理论研究、认真开展扎实的调查研究、蹄疾步稳地开展教育法典草案起草工作。

四、研究前瞻：教育治理研究的未来展望

2023年的教育治理研究成果丰富、重点和特点突出，体现了教育治理研究的学术特色和优势。2024年，教育治理研究将围绕党的二十大对教育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结合“十四五”发展规划的重点内容，进一步聚焦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教育现代化等重点任务，推进教育治理理论研究

与学科体系建设、注重教育治理政策与立法研究、加强教育治理比较研究、深化教育治理实践研究。

1. 推进教育治理理论与学科体系建设

最初，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是以政策话语的形式存在于官方制度文件，后来才作为研究问题与内容出现，进而作为教育学术概念出现在教育研究中。新时代我国教育治理现代化要突破基于实际教育问题的经验探索、提高治理效能，就必须重视教育治理的理论研究，这涉及教育治理思想、教育治理理念、教育治理思维、教育治理原则等观念层面的研究。

综观 2023 年的教育治理研究，学界围绕教育治理的具体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关于教育治理、教育治理学的理论研究仍不够深入，未来将成为各方关注的问题。可以说，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是未来教育治理研究的大趋势。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将逐渐增多，教育治理各主要领域的具体研究也将在学术热点的催动下不断完善。日趋深入的教育治理实践研究将促使教育治理研究融合互通，成为具有独特内涵和内在逻辑的严密整体。尤其是教育治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撰写教育治理学研究专著、编写教育治理学教材、编辑出版教育治理研究的文献汇编，是教育治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点基础工作；设立教育治理学二级学科、招收教育治理学研究生、开设教育治理学课程，是教育治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标志性的工作。理论建设的推进，有助于加速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 注重教育治理政策与立法研究

教育政策是国家和社会根据教育活动的需要与法律法规的要求所制定的政策方案，是政府对教育的制度性安排，涉及教育活动中的多元主体、教育过程中的多样要素，与教育治理的联系紧密。教育政策是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政治依循，在国家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教育政策的研究是教育治理的重要内容，旨在有效发挥政策治理效能，实现政策从文本到研究再到实践的落地。随着教育现代化的推进，教育政策发布的密集程度、全面程度

日益提升，教育政策体系日渐完备，进一步深入开展教育政策研究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教育政策与教育法律都是对教育中各种关系的调节和规范，但又各有不同。教育政策中某些好的经验、理念需经过国家权力机关的认定才能上升为法律规范，而教育法律的颁布也需要相应的配套教育政策。近年来，随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和法治中国的建设，教育法治成为教育治理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教育事业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指导原则。随着依法治教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教育法体系化、法典化命题的推进，学界要通过教育研究为教育立法提供智慧和建议，如此方能实现良法善治、实现教育治理政策化与法治化的共促共进。

3. 加强教育治理比较研究

目前，教育治理研究已在外国教育治理比较研究和全球教育治理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对外开放的深化，教育治理的比较研究仍需加强：如何加强教育治理的比较研究，使其相关成果不再局限于经验总结，而是更为深入地为中国教育治理走向全球教育治理提供哲学、逻辑和方法论的指导；如何通过教育治理的比较研究窥探各国历史文化、政治模式和生活方式，形成更加系统的教育治理理论研究成果，使中国教育更好地走出去、走进去、走下去，都是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此外，已有研究往往局限于探讨“外国对中国的启示”，这并不契合国家“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对外开放国策，有必要予以调整、改进。未来，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进行理论分析和概括、探讨“中国对外国的启示”、基于“中国视角”考察外国教育治理等，可能会逐渐成为后续研究的焦点。

4. 深化教育治理实践研究

近年来，快速、复杂、持续性的教育改革举措在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产生了大量实践性问题。2023年，学界从教育治理视角对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从已有研究来看，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深层次治理问题的研究成果十分鲜见，这些深层次治理问题包括“双减”落地后教

育生态的整体治理、教育监测与评价的数字化治理、乡村教育失落的扭转、东中西部教育差异的弥合、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教育治理、教育数字化治理的伦理风险、学校内部治理模式和校内组织治理等。另外，教育治理过程中政府和多元主体之间如何互动、如何发挥社会组织和群众的积极性、治理效能效率与教育价值如何协调等棘手的实践性问题，也尚缺少深刻的研究成果。上述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既考验教育工作者的思考能力，也反映教育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水平。总之，深化教育治理实践研究，深入教育治理过程的隐秘处，仔细考察教育治理这一复杂多变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互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善治”，是未来学界开展教育治理研究的重点所在。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在“弘扬教育家精神——刘献君教育理念与实践研讨会”上的发言



2024年4月18日，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和文华学院在武汉联合举办“弘扬教育家精神——刘献君教育理念与实践研讨会”。湖北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兼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受邀出席会议。会上，周洪宇教授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为题，回顾了刘献君教授勤学笃行、乐教爱生、求是创新的学术生涯，认为刘献君教授“在大学德育、文化素质教育、院校研究、个性化教育等领域深耕善为，于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其卓越成就与贡献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式教育家的典范，是当之无愧的新时代教育家，其教育理论和实践充分展现了中国式教育家的精神内涵，激励着中国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潜心育人，对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尊敬的献君老师，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各位教师和学生：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应邀参加今天的“弘扬教育家精神——刘献君教育理念与实践研讨会”，也很荣幸能够受邀发言。首先，我要祝贺今天的活动顺利举办，同时也要恭贺献君老师八十大寿！

献君老师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学者型领导，一位很有教育信念、教育情怀、教育追求，也很有教育思想、教育智慧、教育创造、教育贡献和教育影响的教育家。在20世纪80、90年代涌现出来的这一代教育家群体里，他是很有特色、富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工作研究化、研究理论化、理论实践化”。他在近六十年教师职业生涯里担任过学校诸多部门的职务，他有很强的研究意识和研究精神，把每一项工作都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研究到一定程度，就反思总结，形成理论，并运用理论来推动实践。这是我非常钦佩的一点。在他身上，还体现出十分鲜明的“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湖湘学者地域文化特色与优良传统，一件事情只要看准了，就要排除万难、千方百计干成，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也是我这个湖南小老弟非常欣赏的一点。同时，我还观察注意到，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领导们，从第一代的朱九思校长开始，到杨叔子校长、周济校长、李培根校长等，以及包括献君老师在内的一批副书记、副校长，都有重视高等教育研究的传统。朱九思、杨叔子、李培根等人还亲自指导高等教育学的博士生。这些理工科不同专业领域的知名学者、院士亲自研究高等教育问题，这一点在全国高校里可以说绝无仅有，非常难得。我深感，正是这种勤于思索、善于研究、勇于探索、敢于创造的精神，使得华中科技大学在其七十余年发展历程的每个关键节点上，都抓住了机遇、实现了突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更是以高教研究为指导推动了华中科技大学的转型升级，形成了为世人所称道的“华中科技大学办学现象”（包括“华中科技大学校领导高教研究群现象”），这种现象本身就很值得高教研究者来研究，期待有心者对此下功夫，揭示其奥秘。

迄今为止，献君老师是这个校领导群体里面，参与高教研究时间最久、开拓最多、研究成果最丰的一名重要成员，无疑也带有这个群体的共性与特质。一百

多年前（1919年4月）陶行知在其《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里把传统的教育人物，分为三种：一是政客型的教育人物，“只会把持说官话的教育家”，二是书生型的教育人物，“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的教育家”，三是经验型的教育人物，“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他认为这三种都不能算一流的教育家，真正的教育家，要具有开辟的精神、创造的精神，只有具有这两种精神的教育人物，才算是第一流的教育家。献君老师毫无疑问就是具有开辟和创造两种精神的第一流的教育家。

作为活跃在中国高等教育界近60年的研究者与管理者，一方面，献君老师是一个极其严谨的教育研究者，他的学术研究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分析透彻，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主要体现在“大学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素质教育”、“院校研究”“个性化教育”等领域，他是我国“大学德育学”学科领域建设的奠基人之一、“文化素质教育”运动的开拓人之一、中国本土“院校研究”领域的首倡者、个性化教育的构建实施者。

另一方面，献君老师始终坚守在行政管理一线，从参加工作至2023年10月，曾在四所大学任职，在三所大学担任过领导职务，其中一所主持党务工作，一所主持行政工作，一所分管学科建设、人事、宣传、统战、工会工作，他历任华中工学院党委学生工作组组长、组织部副部长、青年工作部副部长，襄樊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中南政法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华中理工大学党校副校长、华中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华学院院长等职务。长期的管理工作实践使得从献君老师能够从政治站位、战略视野来进行教育问题的学术研究。从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抓住问题开展研究，从工作实践中探求学术研究问题和方向，再以学术研究指导和反哺工作实践。

献君老师的学术研究不同于一般学者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而是始终基于实践观察和调查研究，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中国特色。从1972年至1989年，献君老师17年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第一线，由于多次参加全国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讨会，参与全国大学生思想状况调查，得出了大学生思想状况“主流是好的，问题是严重的，责任不在青年”的结论，受到中央领导

同志的肯定。同时，参与撰写中国第一本《大学德育论》，开始引领我国“大学德育学”学科发展与建设。1994年，献君老师开始兼任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为发展文科他提议面向全校举办人文讲座，反响十分热烈。大学生为什么那么喜欢人文讲座？面对于此，献君老师深入思考，在杨叔子校长的支持和指导下，积极向教育部汇报，促成教育部在1995年于华中理工大学召开52所大学参加的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会议，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就此拉开序幕并迅速在全国蓬勃展开。随后，献君老师又深入探索文化素质教育理论，出版了《文化素质教育论》等著作，系统总结了文化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在2003-2023年文华学院创建过程中，献君老师面对多名学生多门考试不及格的问题，又触发了个性化教育的设想。从问题出发，开展研究，提出个性化教育理论，出版了《个性化教育论》一书，并被多所职业院校用于教师学习。这种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从实践问题出发、又回到实践工作的指导上，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他所说的“研究实践，相互推进”。

难能可贵的是，献君老师还身体力行，参与创办两所大学。改革开放之后，百废待兴，国家急需人才。1983年，湖北省政府批准建立襄樊职业大学。随即襄樊市积极筹备，成立“襄阳职业大学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献君老师任党委副书记，为襄樊职业大学的创办做了大量工作。例如：倡导围绕“面向襄樊市，为襄樊市中小型企业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办学思想，积极探索职业大学教育规律。同时引进师资，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创建制度，根据襄大的实际，逐步建立教学管理制度，教师工作量制度，学生管理制度等，使学校有章可循；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等等。

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急需创办大学，扩大招生规模，“独立学院”应运而生。2003年，华中科技大学与美联地产有限公司决定共同创办文华学院。献君老师作为学校代表，以副董事长身份参与领导，2010年起任文华学院院长。献君老师凭借卓越的战略眼光、战略智慧和战略勇气，站在战略的高度，遵循教育规律，适时提出理念思想，凝聚人心，引领学校发展。与广大师生员工共同创造，形成了具有文华学院独特内涵与个性的教育思想、办学特色，将文华学院办成了一所跻身全国民办高校前列的高等学府。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从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六个方面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核心要义，为新时代广大教育工作者指明了方向。以新时代教育家为榜样，深入研讨教育家的教育理念与实践，是深刻理解教育家精神的丰富内涵、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的重要途径。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以“弘扬教育家精神”为主题是十分切题的，献君老师勤学笃行、乐教爱生、求是创新，在大学德育、文化素质教育、院校研究、个性化教育等领域深耕善为，于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其卓越成就与贡献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式教育家的典范，是当之无愧的新时代教育家，其教育理论和实践充分展现了中国式教育家的精神内涵，激励着中国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潜心育人，对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献君老师执教数十年，研究半辈子，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研究成果丰硕，在高教界影响很大。我这里借用自己比较喜欢的两首唐代诗人的诗作来冒昧评介献君老师的贡献和影响。一首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该诗写道：“绿野堂开占物华，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另一首是唐代诗人高适的《别董大二首》“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最后，再次恭贺献君老师八十大寿，安康平顺，祝愿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也希望献君老师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健康长寿，阖家幸福！

新时代基础教育面临的新矛盾

来源 | 全国教育局长高峰论坛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顾明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取得了辉煌成绩。随着全国全面脱贫，义务教育的巩固率有了较大的提高，农村教育有了很大的改善，教育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是，教育领域仍然存在着人民的期盼与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仍然是今后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同时，教育领域中也充满着众多矛盾，需要我们面对和解决。

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他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毛泽东又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教育也不例外，教育领域中充满了种种矛盾。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政治经济社会的变革，教育领域的矛盾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可见，每一个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教育矛盾。教育要发展，就要妥善处理这些矛盾。

今天，我列举十大矛盾，供大家讨论和思考。

矛盾一：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矛盾

主要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如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以及学校之间的教育发展差距都还比较大。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要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其中，提高质量是关键。特别是提高农村教育的质量，没有农村的教育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教育的现代化。

因此，今后的工作要把重点放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的教育发展上。我们要吸取扶贫的经验，东部地区的教育要帮扶西部地区，城市教育要帮扶农村教育。可以采取一个省市帮扶一个省市，一个地区帮扶一个地区，一所学校帮扶一所学校的方式进行。在对口帮扶工作中，最关键的是放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要着重提高农村教师教书育人的水平，提高课堂教育的质量。

矛盾二：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的矛盾

进入新世纪以来，教育从精英教育时代向大众教育时代转变，追求教育公平变成教育的主要问题之一。要解决好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之间的矛盾，就要解决好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办学的差距等问题。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解决好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关键还是要提高质量，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

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教育公平讲得太多了，影响了天才学生的发展。这里，大家要清楚一个概念，教育公平不是平均主义。现在，学生的入学机会公平基本做

到了。但教育过程的公平，比如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均衡等问题还比较突出，这是今后在促进教育公平时要解决的。教育结果的公平，主要表现在孩子的潜在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取得学习的成功。因此说，因材施教，适合每个学生发展的教育，才是最公平的教育。

矛盾三：大众教育与天才教育的矛盾

要不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有没有天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然需要有天才，有拔尖创新人才。大家都在想破解钱学森之问。但是，怎样发现天才培养天才？要在普及的基础上发现天才，而不是拔苗助长。过早的强教蛮灌，适得其反。天才的培养要顺其天性，慢慢发现他（她）的兴趣爱好和能力，加以特殊的培养。少年班、超常班也要在普及的基础上发现、培养。大众教育与天才教育并不矛盾，教育的普及和高质量的大众教育可以发现更多的天才。

矛盾四：教与学的矛盾

这个矛盾在教育界已存在百年以上。大家知道，历史上关于这个问题有两大流派：一派是以德国赫尔巴特为代表，主张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盛行于十九世纪末，被称传统教育派。另一派是以美国杜威为代表，主张儿童中心、活动中心、儿童的经验中心。称为现代教育学派，产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1919年至1921年杜威曾在中国讲学2年2个月，主要就是传播他的教育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学习苏联教育，强调掌握系统的学科知识，掌握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强调师道尊严、教师的主导作用。这实际上是赫尔巴特传统教育的思想。改革开放以后，引进西方教育思想，杜威的教育思想又重新被重视，强调以学生为本。长期以来，教师和学生分得很清楚，教师传授知识，学生接受知识。现代教育已经打破了这种传统，提倡以学生为中心。

1981年，我提出“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生的学习是学生内部矛盾斗争的过程，

教师的教是外部条件。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因为一切知识、技能、价值观都需要学生自主接受，自己消化（内因）。今天的教育，不是学生接受知识，而是建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教师的讲授和引导是外因。

当今信息社会，教师已经不是知识的唯一载体，也不是知识的权威。学生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得信息。因此，今天的教学要从教师的教转化为学生的学。但是，教师是不能或缺的，学生还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教师的引导。这就是师与生、教与学的辩证关系。

矛盾五：知识与能力的矛盾

这一矛盾主要体现在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价值取向。传统教育主要是关注传授知识，强调记忆；现代教育则主张发展思维，培养创造能力。强调记忆就要多做作业，就会增加学生的负担，同时抑制了创造能力的发展。随着二次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的爆炸，记忆式的教育再也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发展能力的主张被提了出来。

上个世纪 50 年代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接着美国《国防教育法》的出台，标志着教育走向现代化。许多教育家都提出要发展能力。美国的布鲁纳在《教育过程》一书中提出：“应该弄清楚培养优异成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它在这里指的，……是要帮助每个学生获得最好的智力发展。”苏联的赞科夫用了 10 年时间开展了教育与发展的实验，提出教育要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只有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创新能力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靠创新。当然发展能力并不排除知识的学习，知识是基础。问题是怎么学习知识？是记忆还是理解？

创新能力有哪些要素？清华大学钱学森班为我们提供了实线经验。钱学生班每年招收 30 名最优秀的学生。到 2018 年办了有 9 年后，发现不是每个优秀的学生都有创造力。他们总结了创造力的五个基本要素。一是内生动力（Motivation）：

对科学发现或技术创新有着痴迷般的极强志趣和不断追求卓越的内在力量；二是开放性（Openness）：有强烈的求知欲、好奇心，具有批判性思维和提出有意义问题的习惯，能从多角度看问题，有很好的观察力，有思维的深度等；三是坚毅力（Grit）：包括开始和过程中有改变的勇气、拥抱失败、屡败屡战，对目标锲而不舍的追求和专注、耐得住寂寞、坚持到底等；四是智慧（wisdom）：不仅包括智商、学有余力，也综合了从他人、从失败、从实践中学习和领悟的能力；五是领导力（Leadership）：对自我的认知，主要衡量远见卓识、正能量、奉献精神、表达能力、动员追随者和资源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这些内容全文发表在《中国教育学刊》2018年第5期。

矛盾六：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矛盾

这里，我们要清楚几个基本概念：考试的性质是手段，不是目的，考试的功能是诊断、检查、选优。学校里平时的考试主要是为了诊断检查学习的情况，以便改进教学，督促学生学习。中考高考是一种选优的考试。现在中小学把中考高考作为目的，考试成了指挥棒，学校的工作围着考试转。而且考试只考知识，以考试的分数高低为标准，学校在应试过程中就忽视了学生的全面素质的提高。把应试作为目的，就违背了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

考试是无法规避的，要找到考试与素质教育的平衡。学校需要转变观念，要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从年轻一代未来的发展出发，坚持党的教育方针，重视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和个性发展。

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的均衡发展。改革招生考试制度，做到既公平又科学的选拔人才。

矛盾七：“双减”与提高教育质量的矛盾

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弊端大家都看到了。“双减”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得到

更好，发展得更好。学生作业负担减轻了，就有时间锻炼身体、走向大自然、走向社会、参加自己喜爱的活动，使自己真正能得到全面发展

“双减”过程中又出现许多新矛盾。一是学生作业少了，会不会降低学习质量？有人提出质疑。二是教师的负担加重了，有的老师反映没有时间备课了。可见，“双减”不仅是教育的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和教育观念问题。

解决这些矛盾唯一出路是改革。学校要端正办学思想，调正运行方式，加强教学管理，把上好每一节课，教好每个学生作为行为准则。只有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才能达到“双减”的目的。让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提高学习效率。教育部门要研究探索，创造“双减”成功的经验，给家长信心。学校和家庭共同努力，达到“双减”的目的。

矛盾八：技术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

早期学校都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在学校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学好数理化，走到天下都不怕”的思想根深蒂固。

教育是未来的事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教育的概念、教育的生态环境，改变着教育形态、教育方式、师生关系、家庭关系等方方面面。教育工作者需要认识这种变革，迎接新的挑战。

这种变革使有些学者持技术主义的态度，认为未来教育将颠覆传统教育，学校要消亡、教师要消失。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本应是为人类服务，为人类谋幸福的，并且需要人来掌握。教育不能单纯地持技术主义态度，虽然信息技术可以提高教学效率，但要注意科学技术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教育的目的是培育人，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不会改变。培养人的技能很重要，培养人的精神世界更重要。

教育的本质不会变。教育传承文化、创造知识、培养人才的本质不会变，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不会变。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5 年《反思教育》报告中所

说：“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可持续的未来共同承担责任。”

2018年7月18日，诺奖获得者霍普克罗夫特（John E·Hopcroft）在北师大举办的“人工智能与教学沙龙”上讲：“智能时代”真的来临，或许还需要40年才能取得突破。他说：“教育问题的核心点是‘爱与关怀’。”“用人工智能取代教师，也许会失掉教育中最重要的因素。”他介绍了一个美国的教育社会实验。该实验经过长达20年的追踪研究发现，真正帮助学生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不是教材和知识本身，而是老师的关怀。他指出，教育问题的核心是“爱与关怀”，一切技术都是辅助手段，只是为教育提供更完善、更优化的渠道和方式。

思考未来教育不能持技术至上的价值取向，要面对未来时代的变化。当今世界，不仅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而且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经济发展动荡不安、经济全球化、人才国际化，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教育要培养面向如此复杂世界，具有高尚品德、勇于担当、奉献精神的创新人才。

矛盾九：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矛盾

现代教育是国际化现象。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教育是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中发展的。教育现代化具有民族性、本土性。现代教育是在本国生长发展的，离不开本国的文化传统，必然有本国本民族的特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中国教育的基因，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现代教育需要交流与合作。人的培养有共同规律，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共同发展。中国现代教育是从西方引进的，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教育更需要加强国际化，扩大教育开放，加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和先进教育技术。但中国教育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教育的根和魂。中国教育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吸收世界先进经验与我国的优秀文化相融合，使之本土化。在融合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矛盾十：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矛盾

学校的目的是立德树人，改革创新。家长的要求是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考上理想的大学。家长有时对学校的教育改革不理解、不支持，有时还会发生冲突。学校减轻了学生的作业负担，家长又给加码。这些问题要在教育内部解决，学校要主动做家长的工作：一是和家长沟通，争取家长的理解和支持。二是帮助家长掌握正确的教育方式方法。学校向家长介绍一些育儿的书籍和经验；与家长研讨一些孩子出现的问题，使家长感到老师真心的关爱自己的孩子，从而支持学校的工作。三是学校要认识和充分利用家庭的资源，共同育人。

教育领域中的矛盾还有许多，如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矛盾、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矛盾、科学研究与教学的矛盾等等。学校内部也有许多矛盾。教育部门的领导、学校的校长需要了解这些矛盾，用自己的智慧和创新实践来解决这些矛盾。



刘大伟

以“有组织科研”突破区域教育科研困境

来源 | 《福建教育杂志》2024年19期



江苏省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刘大伟

2019年10月,《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强调:“进入新时代,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迫切需要教育科研更好地探索规律、破解难题、引领创新。”“鼓励支持中小学教师增强科研意识,积极参与教育教学研究活动,不断深化对教育教学改革的规律性认识,探索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教书育人有效方式和途径,推进素质教育发展。”新时代对基础教育科研的目标任务和使命担当提出了新要求,同时,对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期待。

教师科研能力发展要靠个人研究热情及自我价值实现的主观能动性驱动,也要靠教科研训部门在理论培训与实践指导上的客观精细管理加持,内驱外驱有机配合。这对教科研训部门的科研管理体系顶层设计与实施路径的适配性提出更高

要求。基于此，江苏省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在市域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以“有组织科研”为着力点，做好科研管理顶层制度设计，对不同层次的教师制订差异化专业发展路径，促进教师群体在科研领域的有序发展，实现市域教师队伍素养的整体提升，稳步推进南京基础教育科研人才培养。

一、基础教育教师科研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探索如何提升新时期基础教育教师教科研素养，切实做好科研服务工作，笔者对南京 12 个区的 2159 名中小幼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并对其中的部分教师进行访谈，样本来源覆盖城市各区域，学段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及高中，任教年限涵盖 1-30 年，职称涉及初级、中级和高级，包含所有学科的教师，职务有教师发展中心教科室主任、学校教科室主任、分管副校长、校长和学科教师。笔者围绕基础教育教师的科研现状展开调查，发现基础教育教师科研存在以下问题：

1. 城乡教师科研素养整体水平有明显差距。

调研表明，城乡教师科研整体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从外显数据看，城区和乡村主持或参与省市区级课题研究的教师占当地教师数的比例分别为 34.3%、14.6%，城区教师科研实践明显多于乡村教师。访谈中有乡村教师认为，面向乡村教师的教科研培训并不多，且不少培训内容不太符合学校实际情况，针对性不强，后续又缺乏专家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中的具体指导，所以乡村教师对科研有距离感，积极性不高。乡村学校科研管理制度、科研保障体制不完善，科研氛围不足，以及专家型、学者型教师缺乏等，在外围上影响了乡村教师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行动。

2. 科研选题单一及方案设计空泛。

调查显示，85% 以上的教师围绕课堂教学开展科研选题，50.2% 的教师围绕德育相关内容探索选题，表明教师善于将教育教学实践中观察和反思到的问题转化为科研课题，校本小课题研究已成为教师教育科研的主流。但主动从改革热点、政策导向等角度探索教育科研课题的教师比例较小。对于课题的凝练表达，被访

谈教师表示表达存在宽泛或陈旧的问题，不会将问题凝练和聚焦成科研题目。对于科研方案，教科研管理人员表示主要问题在于教师对课题整体解读表述不清，文献综述只综不述、梳理不够全面准确，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不明确，研究过程叙述笼统、空洞，无法较为准确地评估预期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中文献法和行动法较多，难度较大的实验法等使用非常少，数据处理能力偏弱。这说明教师在科研基础知识、方法、步骤、技能上缺乏指导，需要理论培训与实践指导。

3. 科研成果表述无力及推广效果不明显。

调查显示，教师教育科研成果呈现形式中，教学设计、教学案例占比为65.6%，论文获奖、发表占55.2%，调查报告占7.1%，出版专著占2.8%，这表明教师科研成果表述形式以教育教学实践经验为主。被访谈教师反映，论文和研究报告的撰写是很困难的事，教师对格式和内容的表述经常缺乏规范性和严谨性，对文章内涵的结构化、深入化研究不足，写作能力也需要提高。由于教师研究内容主要是从自身工作实践出发，解决自己在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科研成果更多是为己所用，广泛应用价值不够。再加上区域间科研交流还不够充分，校际合作研究缺乏，使得科研成果推广不及时、效果不明显。这与教师自身理论素养和科学研究活动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

在教师科研培训需求的调查统计中，科研基础知识、科研基本方法和技能、科研和教学整合、科研选题、科研成果梳理和凝练、科研成果呈现是主要内容，专家力量的智力支持成为促进基础教育教科研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以“有组织科研”促进教师科研有序发展

南京在教育强市建设的背景下，面对基层教师在教育科研实践中呈现的具体问题，针对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科研发展的宏观调控，通过“有组织科研”的设计与实施，主动弥合科研问题的整体性发展与强市建设的战略性要求之间的裂隙，实现教育科学与教育政策从互动走向联动。方面，“有组织科研”，体现在顶层制度设计、培养模式、研究方向和科研成果上的组织性；另一方面，“有组织科研”

体现在将管理机制、科研团队和平台搭建形成科研组织合力，共同推动基础教育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于是我们围绕“朴素的教科研”这中心理念，强化制度体系建设和队伍体系建设，实施科研普及、科研培优、科研均衡等工程，针对市域教师科研的实际情况和不同需求开展差异化的科研指导，将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与教育科研引向“有组织”。

1. 制度体系建设。

在制度体系建设上，我们除了学习贯彻国家、省市相关政策文件，进行市级课题管理制度、经费管理制度等服务保障机制的修订和完善，还瞄准教育科学研究方向和研究薄弱环节，增设评价专项、“生活·实践”教育专项、“双减”专项、体卫艺专项、劳动教育专项、“金陵好课堂”创新行动专项、心理教育专项、融合教育专项、面向高中阶段的拔尖创新学生专项等专项课题。一方面抓住基础教育的难点、堵点和痛点，为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做好基础研究；另一方面也为教师科研选题拓宽思路，提升科研选题与改革热点、政策导向的契合度，从而增强科研成果的推广价值。此外，为突出价值导向，提升研究的创新性、学术性、应用性和辐射性，并以评价促进教师在成果表现形式上的多样性，我们特设立南京市“教育科研成果创新奖”。2023年南京市“教育科研成果创新奖”分两个类型的奖项：决策咨询奖主要奖励为教育行政决策咨询而开展的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调查研究、比较研究、政策研究等所取得的优秀成果；实践探索奖主要奖励在解决具体教育教学实践问题方面有新思路、新对策，取得突破性进展，具有显著应用和推广价值的优秀实践成果。由此促进我市教育科研更好地为教育改革实践服务、为教育行政决策服务、为引导社会舆论服务，增强其推广价值。

2. 队伍体系建设。

在队伍体系建设上，我们借助区域优势，与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晓庄学院、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等高校深入合作，共建南京教育智库、扬子江教育智库，将高校专家纳入科研专家库，为市域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特别是南京晓庄学院与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共同组建的新型研究机构南京教育智库，在全国率先构建了“中国教育智库评价体系”，并形成了 CETTE 核心榜单教育智

库和来源教育智库，正式上线 CETTE 中国教育智库评估系统，智库还承办了“中国教育智库建设论坛”等系列高端学术会议。

3. 科研普及工程。

针对市域广大中小幼教师教育科研意识比较强，但缺乏如何做科研的知识和经验的问题，我们实施科研普及工程，目标是实现对市域范围教师科研普及的全覆盖，对基本的科研知识、科研方法和科研路径等进行普及，方式上采取的是线上线下双线融合推进的思路。线上推出“科研普及云端行”品牌活动，针对教师科研存在的现实困难和相关培训的通识性需求，摆脱时空制约，邀请科研专家库成员线上开设系列科研普及培训课程。如针对教师在论文写作指导上的需求，我们方面邀请优秀教师以自身论文写作经验为例，从不同维度出发，分条块讲述论文的选题与写作；另一方面，邀请杂志社主编做研究热点分析、论文评价标准、写作与投稿等方面的指导，从同伴的成功经验分享到杂志社编辑的专业建议，全方位服务教师的论文写作。我们还联合《中国教育打造线上高端教科研普及平台“南京教育科研周”》，2023年组织南京本土7位名师名校校长通过线上直播课的形式，剖析教育发展热点，分享南京教育经验，共同探讨未来教育发展的创新路径，拓宽教师科研的思路和方向。

科研普及工程线下推出“科研普及基层行”品牌活动，根据学校或各区的个性化、典型性教科研问题，市教科所与各区教师发展中心联合，强化区域联动科研，以问题为导向，疏通堵点，赴基层学校为教师提供针对性的科研指导。我们还编写《中小幼教师如何做好教科研》普及读本，进步将科研普及落实到具体实践情境中。

4. 科研培优工程。

针对有更高发展目标的教师群体，为有组织地培养更多的名特优教师，我们实施科研培优工程。科研培优工程的目标是在科研普及工程造就的“高原”上再造“高峰”。为此，我们提出教科研人才的“千计百方”工程，并分步骤有组织地稳步推进实施。“千计”是指面向2035遴选培育约1000名40岁左右的教育科研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力争做到全程全方位跟踪培养，达到堆聚人才高原的目的。“百方”指向人才高峰，旨在推动批专家型教师立足当地教育实际，

梳理提炼教学主张、教育理念和学术思想，出版“百本中国教育改革方案”，在科研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中，实现名特优教师队伍的卓越发展。指向“百本中国教育改革方案”目标的“南京教育文库”工作启动后，得到名特优教师群体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为更好促进“南京教育文库”作者科研成果的高质量表述，我们带领《南京教育文库（第一辑）》作者赴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教法》编辑部、人大复印资料报刊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教育学会等现场交流学习。2023年《南京教育文库（第一辑）》7本在北京发布，紧接着7位学者型教师陆续召开专场科研活动现场会，通过课堂展示、研究汇报、沙龙研讨、专家指导等形式，进步推广科研成果，聚积榜样示范、引领效应。此外，“南京教育科研周”名特优教师系列科研成果持续在《中国教育报》刊发，将南京教育的声音传播到全国各地。这既实现了名特优教师在项目驱动中的自身发展，也带动引领着更多教师的自我实现。

5. 科研均衡工程。

针对城乡教师科研素养整体水平及区域教师群体发展间有差距的问题，我们实施科研均衡工程，以实现城乡、区域教师群体发展的均衡化和优质化，通过科研的优质均衡推动全市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值得提的是，我们成立“乡村教育研究中心”，实地走访市域范围内所有的乡村学校乃至每个办学点，通过实地调查深入了解乡村教师科研面临的困难和实际需求。首先，我们根据调查结果展开研究，撰写《南京市乡村教育调研报告》，并呈交给教育主管部门，为教育行政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为实施精准乡村教育振兴政策提供支持。其次，根据实地调研情况，“乡村教育研究中心”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区域联动、优质均衡”的工作原则，开展科研协同活动，以科研强区、科研强校为龙头，手拉手带动批乡村学校和教师的发展。“乡村教育研究中心”还就具体乡村学校的科研发展提供个性化方案，定期开展点对点“乡村送教”活动。再次，市域范围的高端培训，倾向将乡村教育调研中呈现的对科研有强烈需求的教师纳入其中，持续给予专家资源支持，带动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南京市开展的“有组织科研”，力求根据实际问题，将基础教育教师科研能力发展从“无组织”引导向“有组织”，有规划、系统性地构建起种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教师培养模式。

付卫东

加大问责力度 真正落实教师减负清单

来源 | 《中国教育报》2024年3月21日 02版



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付卫东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健全监督机制，建立非教学事务进校园举报电话并向全社会公布，对查证属实情况的责任人进行处分。

其实，中小学教师减负的步伐，多年来从未停下，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和举措。例如，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22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等。然而，中小学教师减负不到位、不彻底的问题仍比较普遍，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的现象依然存在。

尽管各地政府开出内容翔实的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如严控督查、检查、评估、

考核、评比等活动进校园，禁止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各种投票、点赞、答题、知识竞赛、推广活动进校园。然而，一些地方习惯用“减负文件”落实教师减负，用“具体规定”执行“具体规定”，用“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各级政府的督导落实不到位。《意见》明确规定，要加强督导，并明晰了各级政府的督导职责和督导结果运用。但事实上，中小学教师减负督导工作容易流于形式、落实不到位；督导报告有时缺乏权威性，出现隔靴搔痒、不痛不痒的现象；教育督导刚性约束和权威性不够，督导意见常常被束之高阁；整改问责不力，没有真正形成震慑效果。

督导“长牙齿”，问责必有力。在问责机制方面，《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通过完善报告、规范反馈、强化整改等八个方面的制度，提高教育督导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中小学教师减负，也要强化问责机制，充分发挥教育督导“指挥棒”“助力器”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强化督导整改制度。督导整改，是切实履行政府职责、解决重大民生问题的重要手段。被约谈单位要牢固树立“问题必整改，整改必到位”的责任意识，切实维护教师减负督导工作的严肃性；对整改不到位、不及时的，要发督办单，限期整改。同时，建立“回头看”机制，通过大数据核查、实地察看、交流座谈、问卷调查、部门反馈等多种形式，抓住问题线索，动真碰硬，对教师减负整改情况及时进行复查，掌握真实情况，防止中小学教师减负问题反弹。

认真落实督导激励约束制度。中小学教师减负落实不到位，关键原因之一是缺乏强有力的奖惩机制。坚持“激励有为”的原则，对中小学教师减负督导结果优秀的单位及有关负责人进行表彰，在政策支持、资源配置、资金分配等方面对被督导单位予以倾斜；在领导干部考核、任免、奖惩中要注意对中小学教师减负督导结果的运用，必要时可将其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参考，让相关负责人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强化“整肃不力”的问责力度，对于中小学教师减负不到位的单位，在政策支持、资源配置、资金分配等方面予以扣减，对执行不力、落实不到位的

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起到震慑的作用。

着力压实问责制度。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强化问责，是督导“长牙齿”的有力保障。强化中小学教师减负督导结果运用，让督导问责“硬起来”。强化督导减负的权威性，实现“三个转变”，即由教育部门为主转变为以党委政府为主、由仅考核政府班子向既考核政府又考核党政领导干部转变、由仅督责向既督责又问责转变，让地方党委政府在中小学教师减负中共同担责。注重督导减负的约束性，为了避免隔靴搔痒、不痛不痒的问题，要将中小学教师减负列入地方党委政府年度工作计划，将减负效果纳入党政主职年度考核体系，违反减负禁令的部门和相关责任人要受到相应的处分。

中小学教师减负，关键在于落实。要加大问责力度，对于执行不力、落实不到位的严肃问责，才能扎扎实实将教师减负工作一抓到底，求得实效，让广大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



付睿

全球教育话语权塑造：全球教育治理的中国实践

来源 | 《比较教育研究》2024年05期



温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副秘书长 付睿

新时代的中国正处于加快建成教育强国的关键期。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拥有全球教育话语权是世界教育强国的重要表征之一，全球教育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塑造国家全球教育话语权的基本路径。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是教育领域协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式，全球教育话语权塑造则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核心价值。话语权是行动者作为主体所具有的话语自由与主体作为权威话语者对客体的多方面影响的统一。全球教育话语权是以国家教育利益为核心，在国际公共空间对本国和全球教育事务拥有自由表达、传播及参与的权利及贯穿这一过程的权力。中国结合自身国情及时代变化趋势选择适合的治理工具介入全球教育治理进程之中，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能力的进步，中国塑造全球教育话语权的工具与路径渐趋多元化。从理论层面梳理中国基于全球教育治理塑造全球教育话语权所取得的成效，可为中国的全球教育治理话语体系形成、加快建成教育强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益参考。

一、平台融合：全球教育治理场域建构渐趋成型

场域理论认为，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构型，既指物理环境，也包含人与组织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是结构化的关系空间。合适的场域是治理生发的前提，全球教育治理场域在物理形态上表现为国际组织平台的建构与融合，在关系形态上表现为全球教育运动、教育议程以及教育标准规则相互间的结构化关系网络。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必然需要寻找与治理目标契合的治理平台与机制，通过平台的加入、合作与融合，以及参与教育运动、议程、规则实现全球教育治理场域的营造，建构与目标契合的结构化关系网络，以此获得全球教育话语权。

（一）积极与国际组织合作，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改革

加入国际组织是主权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的基本方式，也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路径。中国积极加入各类涉及教育领域的国际组织，开展教育对话与交流，建立教育共识，提升国家在全球教育领域的话语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是中国实行教育对外开放、开展国际教育合作的重要伙伴与关键场域。中国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经历了三个阶段：作为平台，学习世界先进理念和经验一边学习，边实践—双向互动，实现共赢。教科文组织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传播优秀教育思想和理念，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教育发展水平，也是中国传播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的重要平台。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不仅促使中国与该组织的合作关系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而且推动了二者在教育领域合作关系走向新高度，中国的全球教育治理场域建构进程加速。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践活动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中国和国际社会文化体系而言是一个互构过程。2017年，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了《教育、

科学与文化组织合作谅解备忘录（2017 - 2020）》，表明中国积极参与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30教育议程”（Education2030），推动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领域的广泛深入合作，让国家的教育事业与世界教育发展实现链接及互动，对中国全球教育话语权塑造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与国际组织合作设立教育分支机构，改进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体系结构和治理能力。国际组织选择在一个国家设置某领域的专业分支机构，说明该国此专业领域具有全球领先的能力水平与国际地位。中国积极争取在国内设立了一系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类、二类机构，如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国际工程教育中心、高等教育创新中心、教师教育中心、中国创业教育联盟、联系学校国际中心等。综合型、专门型的国际组织教育研究分支机构的设立有利于密切中国及中心所在地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各类教育机构的合作。中国可以更便捷地参与全球性教育发展议程，实现中国教育事业与全球教育的同步发展，扩大中心所在地及中国的教育国际影响力、国际知名度，中国具有了更多样化的全球教育话语权塑造场域。

（二）参与全球教育运动及教育议程设置，推动教育普及与教育公平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教育运动，推动教育普及、教育平等和教育公平的实现，促进社会进步。全球教育运动是全球范围内发起、世界各国普遍参与的大规模教育行动，包括教育普及、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等运动。新中国成立70余年，中国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教育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以高等教育为例，1949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0.26%，全国高等教育在校生只有11.7万人，202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60.2%，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增加到4763.19万人，相比1949年增长了407倍。中国的教育普及和教育公平成为全球教育普及运动的典范。中国还积极参与联合国教育发展议程设置。议程是事先安排在某个指定时间进行讨论的一项事务，世界性教育议程设置能力是一个国家在全球教育事务中话语权最直接显现。教育问题是世界发展议程的重要内容，中国通过发布报告、文件表明中国的主张和态度，同时通过参与各类会议，与世界各国对话、交流，把

中国的教育主张及实践经验推介出去，以此对世界性教育发展议程产生影响。中国还参与发布全球性教育宣言，积极推动全球教育信息化进程。互联网络和通信技术的普及使教育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教育管理以及教与学的过程应进行重塑，以适应个人自我发展和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需要。2014年，中国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教育第一”全球倡议高级别会议上表示，中国政府支持将“确保到2030年，实现全民享受公平、包容和有质量的终身教育和学习”作为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重要目标列入文件框架。随后，中国参与了教科文组织《教育2030行动框架》（Education 2030 Framework for Action）的起草，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唐虔与全民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席丹克特·维德勒（Dankert Vedeler）共同担任起草委员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通过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体现了中国提出的终身教育目标。上述活动表明，随着教育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全球教育议程设置中的地位与话语权得到提升。

（三）参与国际通用教育标准制定，贡献中国教育经验与智慧

参与国际标准与规则的制定是国家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及维护全球共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公共服务标准化是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教育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其标准化越来越受到重视。教育标准是指“以教育教学实践及理论研究为基础，对各级各类教育、教学活动事项制定的相关规范与技术规定”，其目的是有效实施国家教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维护教育活动的秩序。世界各国的教育标准一般由政府主导，社会专业机构参与共同制定，质量标准是教育标准体系的核心部分。中国目前有30多所高校从事标准教育，培养标准制定相关人才。2007年，中国计量大学宋明顺教授代表中国获得第30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大会颁发的“标准化高等教育奖”，该奖项是对中国在高等教育标准化方面努力的认可，中国的标准教育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积极影响。教育服务标准化为教育服务走出国门奠定了基础。2009年，教育部、人社部、文化部等单位共同组建成立全国教育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43），承担义务教育和国家正规高等教育之外的市场化教育服务。2017年，国家设立了“全国教育服务标准化信息平台”，涵盖留学服务标准化、语培服务标准化、研学服务标准化、早教服务标

准化、成教服务标准化、职业教育标准化等，为中国教育服务标准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2018年，全球首个“一带一路”标准化教育与研究大学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在中国计量大学成立，已有来自30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105所高校加盟，其中境外高校37所，涉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19个。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都致力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互联互通，标准与教育有机结合，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标准化教育以及教育的标准化，为各国相互交流、增进了解提供有效的工具，将确保各国的民心相通、和谐共处共赢。上述联盟的成立为打造“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提供标准层面的场域，推动全球标准化教育和研究的共商共享，提升了中国标准化教育方案在全球标准化教育领域的话语权。

二、教育能力建设：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提升

教育能力建设是指国家或教育组织通过建立教育治理制度、体系和机制，开展教育技能培训，开发教育资源和构建学习网络，促进教育问题解决，进而实现发展愿景的一系列过程，对教育问题的解决及实现教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通过供给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促进发展中国家教育能力建设是获取国际社会认可的重要路径，是塑造全球教育话语权的基础。一个健全的教育体系是以权利为基础的，旨在增强社会凝聚力、实现机会平等和公平。因而，中国提供教育国际公共产品对促进世界教育发展的公平性具有积极作用。教育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三个维度：最高层次的教育国际公共产品——知识，条件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规约、倡议与标准，器物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资金与援助。本文主要从组织建设、知识、资金与援助的维度分析中国的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发展中国家教育能力建设的互动关系。

（一）完善组织与平台建设，促进发展中国家教育能力建设

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参与全球治理步伐的加快，中国积极参与发展中国家

的教育能力建设进程。21 世纪以来，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交流制定及实施教育战略规划、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思想理念及实践经验，并通过教育发展项目支持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国家进行教育能力建设，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水平与自我发展能力。

一是完善组织建设，建立专门机构，为对外教育援助搭建组织平台。在组织层面，中国对外教育援助管理部门由分散走向统一。2018 年，中国成立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统筹对外援助，结束了多头分散管理的局面，其他部门如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驻外使领馆等协同开展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对外援助工作，提升了对外教育援助的成效。在实践层面，中国广泛交流和分享自身教育减贫经验与智慧。减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任务，教育作为减贫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可以有效改善民生。2005 年，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国际组织联合成立国际扶贫中心（Inter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Centre），以提升发展中国家减贫与发展能力为目标，以分享中国减贫政策与经验为基础，组织开展国际减贫培训。截至 2020 年底，在国务院扶贫办、商务部、财政部、外交部等中国政府有关部委和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的支持与协作下，共举办了 159 期国际减贫研修班，对 136 个国家（地区）的 4233 名政府官员与扶贫工作者进行了专题减贫培训。减贫培训有效地提升了参训国家人员的减贫能力。此外，国际扶贫中心还发布一系列研究报告，不仅研究总结中国通过教育减贫的经验供世界各国借鉴，而且还研究发展中国家与教育相关的减贫经验，供中国和其他国家参考，实现了“中国减贫经验国际化，国际减贫经验中国化”，体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倡导的互学互鉴、共赢共享的理念。中国与国际组织共同设立专门机构，通过培训和教育等方式推动了发展中国家减贫事业的进步。2021 年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进一步塑造了中国在教育减贫领域的全球教育话语权。

二是通过基金和合作计划建设人才培养平台，为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国家培养高级人才。受益于基金和合作计划，许多来华留学人员归国后逐渐成长为所

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领军人物。据统计，改革开放 30 年间来华留学毕业生中已有 30 多人先后担任所在国的部长级职位，近 20 人担任驻华大使，有 30 多人担任驻华使馆参赞，成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进行友好交流与合作的使者。中国还通过与国际组织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培养高端人才。例如，中国与联合国合作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与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开展“中国——上海合作组织人力资源开发合作计划”，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信托基金”，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长城奖学金计划”等。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信托基金”项目既是中国首次通过多边机构成立信托基金支持非洲发展，也是联合国系统国际组织首次收到来自中国、用于促进非洲教师培训的大额资助，开创了通过多边机构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新途径。中国通过基金和计划在有关发展中国家实施近百个能力建设项目，改善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状况，推动了发展中国家教育能力建设进程，改善了相关国家教育治理能力，加强了中国与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的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未来，中国的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将更多地转移到强化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教育能力建设层面，坚持平等互利原则，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教育的自主性、独立性，增强其内生动力，让发展中国家能独立、高质量地制定本国的教育发展战略、实行教育改革，最终实现教育的自主可持续发展，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发展中国家教育能力建设的成功也将为中国提供更为长久的优质合作伙伴，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

（二） 中国代表担任国际组织重要职位，增强全球教育议程及规则制定话语权

一个国家的专业人员在国际组织担任教育领域的重要职位是该国全球教育话语权的象征。中国 1972 年恢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席位，尽管一直担任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但话语权有限。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话语权日益凸显。2005 年，时任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理事会主席。2013 年，时任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7 届大会上当选为新一届大会主席。这是该组织成立 68 年来中国代表首次获选大会主席，创造了历史上首次获得全体 195 个会员国全票通过的纪录。这是包括第三世界国家、非洲国家、周边国家在内的众多国家对能够在教科文组织中发挥大国积极作用的期待。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其中一项重要职责是组织制定与教育科技和文化相关的国际规则 and 标准，中国过去都是以执行局委员的身份参加教科文组织的活动，更多时候是旁观者和观察者的角色表达意见和诉求，而这次当选标志着中国成为关键参与者，为中国有效参与教科文组织的教育议程制定提供了更多话语空间。

中国的国际化人才在国际组织担任教育相关的重要职位逐渐增多。2012 年，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汪利兵教授成功竞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局教育创新和技能发展部负责人。201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曲星为该组织副总干事，时任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杜越成功竞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部门协调和伙伴关系局局长。王燕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发展工作组教育网络协调人、展涛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人陆续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涉及教育事务的高级官员，彰显中国的国际化人才在多边国际合作领域参与全球教育事务的能力，丰富了教科文组织结构与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中国的国际化人才加入教科文组织，可以把中国教育的经验、中国智慧、优秀的教育传统文化向世界推介，同时吸收世界教育的先进理念与思想，从而实现本土与国际的融合创新，形成国家教育软实力。

（三）提供对外教育资金、知识与技术援助，促进受援国社会发展

国际教育援助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塑造全球教育话语权的重要形式。国际教育援助是指国际间援助方为受援方在教育领域所提供的贷款、无偿赠款及专业技术资源的一种援助形式。进入 21 世纪，中国在国际发展机构中已经从受援国的角色转变成为一个重要的援助国，成为国际组织发展议程的关键合作伙伴，开始注重由“援助的有效性”向“发展的有效性”的转变，在全球发展议程的讨论和协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对外教育援助通常表现为资金、知识和技术的融合援助，为受援国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一是资金援助。新中国成立至 2015 年，累计向 166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 4000 亿元人民币援助资金，派遣 60 多万援助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领域建设，推动了南南合作水平走向新阶段。二是教育知识、技术援助与人力资源开发。中国在 61 个国家开展对外教育知识及技术援助与合作，其中包括文化教育领域项目。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人力资源开发是旨在通过组织发展及提升绩效的个人培训来提高人员专门技能的过程。中国通过多边、双边机制为发展中国家开展政府官员、管理人员、教师、专业技术人员的研修培训，开展不同层次的学历学位教育、人员交流互访项目。中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为周边及非洲发展中国家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截至 2016 年底，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在华举办各类培训班 11000 多期；培训人员 26 万人次，包括官员、实习生、管理和技术人员；累计资助来自 119 个发展中国家共计 70627 名留学生来华进行各类专业学习，派遣近 1 万名援外教师，为受援国培训校长和教师 1 万余名；还通过技术合作等方式为受援国就地培训了大量管理和技术人员；目前，每年在华培训发展中国家人员约 1 万名左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以“学堂在线”“爱课程”为代表的首批高等学校在线教学国际平台面向全世界各国大学生和学习者免费开放，并提供高质量教与学服务。随后，这些平台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联盟，为全球学习者提供远程教育解决方案。向世界各国开放大规模在线课程资源，这是中国向全球提供最高层级的知识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的举措，为弥补全球日益加深的数字鸿沟做出了尝试。

中国提供的教育国际公共产品涉及教育资金、硬件设施、技术支持和师资培训，助力发展中国家教育能力建设，提升受援国教育内生性发展的动力，从而为受援国长期良性发展奠定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调整了对外援助战略和方式，既注重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又同向推动联合国《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为“一带一路”倡议打造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中国开展对外教育援助、交流与合作，反映了中国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具有全面性、针对性和

深度参与性的结构特点，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经合组织（OECD）、世界银行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理念和价值取向存在显著差异，是中国塑造全球教育话语权的独特性所在。

（四）设立全球性教育奖项，传播中国教育理念

设立全球性教育奖项是知识性与器物性相互融合的一种教育国际公共产品，是一个国家面向世界传递教育价值观、塑造全球教育话语权的重要路径。2005年，在中国的支持和倡导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面向全球设立“孔子教育奖”（The UNESCO Confucius Prize for Literacy），表彰在教育领域取得非凡成就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有突出贡献的个人，实施计划由中国具体负责。该奖项是首个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全球性奖项，是教科文组织系统内仅有的支持扫盲和弱势群体教育的两个奖项之一。截至2023年，“孔子教育奖”已评选并表彰18届，涉及致力于扫盲教育工作的30多个国家的47个项目，体现了该奖项的发展性与全球性。“孔子教育奖”已成为全球性教育奖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及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全民教育”理念有内在的一致性，在价值层面获得了世界各国认同，被誉为教育界的“诺贝尔奖”。这表明中国倡导的“有教无类”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国际传播加速，中国在全球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得以扩大，这是中国教育智慧对世界的贡献。

教育领域的性别歧视既是社会上更多形式的性别不平等的原因，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为促进全球性别平等，支持和推动全球女童及妇女教育发展，中国政府于2016年提议并资助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UNESCO Prize for Girl's and Women's Education），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该领域设立的唯一奖项。该奖项主要表彰个人、机构和组织为推动女童和妇女教育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和创新，发挥展示成功项目的独特作用，促进和改善女孩和妇女的教育机会，从而提高她们的生活质量。该奖项从影响、创新、可持续性、可复制性和可扩展性、优先领域贡献5个维度明确了参加评选的项目或方案所需具备的基本要素，注重项目或方案成果的可观测性、过程的延续性和推广价值，为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

的未来发展确立了基本价值取向。同时，中国也通过奖项搭建的平台与世界分享了自身独特的教育发展理念及经验。中国设立的一系列全球性教育奖项实质是教育国际公共产品的一种表现形态，既推动了发展中国家教育变革，又广泛传播了中国本土教育实践经验和理念，塑造了中国在全球教育领域的新形象，扩大了中国教育的全球影响力和话语权。

三、全球非正式教育治理：推动全球教育秩序走向公平公正

全球教育治理按运行机制的不同可以分为全球正式教育治理与全球非正式教育治理。以国际组织为主体的全球正式教育治理往往由西方国家主导，广大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不足。全球非正式教育治理是指全球主要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与代表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经济体，通过国际论坛、峰会等非正式国际组织交流形式就全球性教育问题进行平等协商、达成共识的非正式制度设计，它具有自由性、灵活性、开放性和软约束性等特征。参与全球非正式教育治理可以充分表达中国的教育主张和观点，是塑造全球教育话语权、推动全球教育秩序走向公平与公正的重要路径。中国参与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简称“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Group of Twenty, G20）、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或区域性论坛，介入全球非正式教育治理，增进中国的全球教育话语权。

（一）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相关活动，传播中国教育实践理念及经验

中国通过亚太经合组织教育部长会议提出教育议题，凸显中国在亚太地区教育领域的影响力。中国派出教育部带领的代表团参加历届亚太经合组织教育部长会议，在会上宣传推介中国积累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为各国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加快了中国教育智慧走向世界的步伐。2016年，中国牵头、联合各成员共同研制的《亚太经合组织教育战略》（APEC Education Strategy）在亚太经合组织教育部长会议上通过。该战略是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以来首个教育领域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文件，确定了到2030年亚太地区教育发展的愿景、目标与行动，引领未来亚太地

区教育发展。2017年，中国牵头制定的《亚太经合组织教育战略行动计划》（Action Plan of the APEC Education Strategy）被顺利写入《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联合部长声明》（APEC Ministerial Meeting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中方人员还在其中承担了教育网络协调人的角色。在这项关涉整个亚太地区教育、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及其行动计划的倡议、商定和出台过程中，中国不仅是一个参与者，而且承担着协调者和引领者的重要角色，发挥着建设性、开创性作用，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体现，表明中国在全球非正式教育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得到强化。此外，中国主办了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议、2008年第四次亚太经合组织教育部长会议预备会、2018年亚太经合组织教育与经济发展政策对话会、历届亚太地区教育部长会议等高级别活动，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教育部负责人、国家级教育智库负责人等均在历届会议上充分阐述、宣传推介中国的教育理念、主张与实践经验，展示了中国在亚太地区教育领域的领导力和影响力。

（二）通过 G20 参与全球教育议题设置，提供知识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

知识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与器物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相对应，外显为应对全球性教育问题而设计的一系列教育治理制度、机制、规则与标准等。知识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是解决全球性教育问题的重要工具，需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遵循多边主义原则和携手合作，才能保障教育国际公共产品的充分有效供给。G20 作为 21 世纪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国际论坛之一，教育议题逐渐成为其议程的组成部分，属于全球非正式教育治理模式的典型，在全球教育治理中扮演着传统国际组织之外的另一种角色，发挥着独特作用。G20 公报涉及的教育议题是展现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及发展平等性的重要载体。G20 峰会每次结束后均发表公报，并附上一系列行动计划、改革议程等，以此协调各国关切的优先事项，其涉及教育的内容如金融教育、青年教育与培训、反腐败教育等，Xt 推动 G20 各成员国的教育变革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与推动作用。历届 G20 峰会发布的公报及所附的文件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教育领域发挥的影响，尤其是中国 2016 年主办的 G20 杭州峰会，以及主办为落实峰会教育共识的 G20 教育对话会议，充分表明了中国参与全球非正式教育治理的重要角色与地位。召开部长会议发布与教育相

关的联合声明，是 G20 提供知识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方式。从 2010 年至今，G20 峰会的劳工和教育部长会议均对全球的就业、教育及培训等问题提出了政策倡议，做出承诺和发布宣言，并将其作为建议提交给领导人峰会。中国在历届 G20 教育部长会议上均积极分享中国教育经验和主张。2018 年，中国在阿根廷举行的 G20 教育部长会议和劳工与教育部长联合会议上提出倡导终身学习理念，推动教育培训国际合作，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在 2021 年的教育部长会议上，中国分享了中国政府破解教育贫困、保障教育连续性、推进后疫情时代教育的探索，倡议推动实现可持续的全球教育减贫；在 2022 年的教育部长会议上，中国宣介了教育均衡发展、教育数字化建设经验，提出共同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执行力的倡议，展现了中国在世界教育领域的引领性。当然，相较 G20 在全球经济政策中具有的重要影响力，G20 在全球教育治理中仍处于边缘地位，且近十年受国际形势剧变影响，其作用的发挥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在 G20 为全球提供知识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将扮演积极参与者、承担者的重要角色，继续推动世界教育秩序走向公平公正。

（三）主办亚洲教育论坛，促进亚洲地区教育交流与合作

论坛是参与主体间就相关议题进行平等对话的平台，以平等性、交互性为基本特征。亚洲教育论坛是中国以博鳌亚洲论坛为依托主导设立，关注亚洲教育问题的一个国际性交流对话平台，通过定期举办论坛推动亚洲教育问题的解决。截至 2023 年，中国已成功举办 20 届亚洲教育论坛，开展了包括亚洲教育部长级射义、博鳌亚洲教育合作磋商机制（司局级）在内的一系列官方磋商活动，论坛各个级别的官方磋商议题广泛，涉及各级各类教育，与全球教育发展趋势相呼应。亚洲教育论坛把政府、民间力量聚集起来，形成一个稳定的亚洲教育对话与磋商机制，有利于亚洲教育成果经验、资源的交流与共享，提升亚洲在全球的整体竞争力。中国协同各方充分发挥亚洲教育论坛的作用，进一步扩大其在亚洲乃至世界教育领域的影响，真正实现论坛“架起亚洲教育合作桥梁”的宗旨，促进亚洲教育发展，中国在亚洲教育领域的谢吾权日益彰显。中国借助亚太经合组织、G20、亚洲教育论坛等全球非正式教育治理平台与机制介入全球教育事务，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实践场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提供了教育的力量。

四、多元共治：推动全球教育治理参与主体多元化

教育智库、非政府组织和企业既是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也是建构全球教育话语权的多元主体。非政府主体的介入可以形成多元共治的格局，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主体多元化与决策科学化，丰富中国全球教育话语权主体的多元性，增进话语形式的多样性。

（一）发挥教育智库功能，塑造中国教育国际形象

教育智库是对国家教育重大战略及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研究与咨询的专门机构。教育智库发挥公共外交功能，与国外机构进行教育交流与合作，共同开展联合研究与咨询，与世界分享中国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经验，可以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与理解，塑造中国教育国际形象。教育国际形象是一个国家的教育历史、教育思想、教育文化及师生风貌等在国际社会的总体印象。教育智库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是塑造国家良好教育国际形象的重要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对智库建设的高度重视，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等为代表的一批官方、高校、民间的教育智库积极发挥公共外交功能，与众多国家及国际组织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积极为全球教育活动贡献智慧，在对外交往活动中塑造了中国教育改革创新的良好国际形象。智库作为对未来负有预见性责任的专门机构，尤其要通过广泛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对未来不确定性问题的前瞻性、预测性研究，共同努力将不确定的因素转化为确定因素，将确定因素更多地转化为积极正面的因素。中国的各类教育智库通过与各国机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开展合作、举办国际研讨会、国际论坛、参与全球教育问题研究、发布全球教育相关主题研究报告、组联盟等形式，将中国及全球教育领域诸多的不确定性渐进地转化为确定性或积极的正面因素，从智库层面塑造了中国教育国际形象，增强了全球教育话语权。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传播公益性价值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及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非政府组织正逐渐壮大，并参与到全球教育治理之中，与政府部门形成重要的互补关系，成为中国开展全球教

育治理的重要行为体。非政府组织是在地方、国家或国际层面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自愿公民组织，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益性是其共同特征。在全球治理层面，非政府组织面对的主要是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治理公益性议题，传播公益性价值，与主权国家、跨国企业互为补充，在全球教育治理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与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的公益组织合作开展与教育相关的国际发展项目和国际人道救援，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传播公益性价值的重要力量。中国扶贫基金会是中国扶贫公益领域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扶贫公益组织之一，2005年开始对外援助，2009年成立国际发展项目部开展国际项目援助，先后对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的1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援助项目，涉及包括国际饥饿儿童营养餐、大学生资助、移动学校等教育项目，有效地传递了中国教育减贫经验，传播了中国教育思想与理念，在受助各国中产生了积极反响。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开展各类教育公益项目、合作交流活动等，具有非营利性和广泛的社会效益性特点，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教育的发展，为增进中国与各国民心相通作出了积极贡献，充分传播了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公益性价值。

（三）企业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引领世界教育创新前沿

全国教育话语权的塑造一定程度上要以教育创新能力为依托。企业是教育创新的领导者，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加速，为了营造适宜的社会环境，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公益性教育创新活动成为内生性需求。21世纪以来，中国企业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引领全球教育创新的活动呈上升趋势，如完美世界、海航集团、华为等。2018年，完美世界与南非及中国高等职业院校共同倡议发起成立“中国—南非职业教育合作联盟”，通过自身丰富的资源优势及校企合作经验，与中国和南非高校、企业开展交流合作，为中国和南非学生提供人文交流、实习实训的机会，发挥教育培训在两国人文交流和社会发展中的先导性、基础性作用，夯实两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海航集团积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United Nations World Food Programme）等机构合作，改善亚非地区教育状况。海航集团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与国际航空业之间的“凝聚爱心”项目、亚非妇女及女童教育保护项目、叙利亚难民救助、海地儿童救助、加纳学校营养餐计划、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高等教育援助项目、促进中非文化交流等，积极履行全球公民的责任，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也扩展了中国在全球教育领域的话语权。华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教育领域提供信息技术设备，培训相关人才，推动各国教育发展与教育公平。2018年，作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相关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华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大学合作，在南非信息化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推出有关ICT学院项目合作计划，利用自身行业优势为全球培养信息技术人才。截至2023年，华为ICT学院已覆盖110多个国家，建立2600多所ICT学院，拥有1.1万名教师，每年培养20万名学生。华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UNESCO - ICHEI）是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在非洲、亚太地区和中东欧的教育事务方面开展了合作。合作领域涉及高等教育创新、非洲ICT人才培养和人工智能等。高等教育治理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积极作用，华为开展的治理活动促进了非洲高等教育创新，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4作出了贡献。华为还实施了“全球数字包容计划”（TECH4ALL），平等优质教育是其四大领域之一。华为通过“未来种子计划”已帮助超过108个国家的3万多名学生提高了数字技能。华为以长期积累的产品和技术为基础，联合国际组织、教育机构和相关伙伴共建人才生态系统，逐步形成领先开放的全球人才培养体系，为推动全球数字化转型作出了积极贡献，发挥了企业引领全球教育创新与发展的独特价值。

可见，中国企业以自身行业特色及前沿科技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这是中国企业科技和软实力不断增强的体现，展示了中国企业的教育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在全球教育话语权塑造维度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优势。

五、结语

中国通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塑造全球教育话语权的理念、组织、制度、机制迭代升级，能力持续增强，治理成效显著。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主体走向多元化，体系与能力渐趋完善，涉及教育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在拓展，中国的全球教育话语权日益彰显。这既是中国全球教育治理能力提升的必然，也是中国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科技、人才等因素合力的结果，彰显了中国携手全球各国及组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与生动写照。随着新时代中国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战略的推进，时势对中国的全球教育话语权提出了更高要求。全球教育话语权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需要中国在教育理念与思想引领、全球教育规则与标准制定、国际化人才培养与全球教育公共产品供给等维度持续加强能力建设，发挥中国在全球教育治理进程中的多元化与广泛性角色，有效提升全球教育话语权，为加快建成教育强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2024 西安·长江教育论坛“教育家精神培育与基础教育强国建设”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

4月20日,2024西安·长江教育论坛“教育家精神培育与基础教育强国建设”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成功举行。本次会议是陕西师范大学80周年校庆的系列活动之一,由长江教育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陕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处、陕西教师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陕西师范大学教师发展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南方教育发展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基础教育新型智库、《教育治理研究》编辑部、《当代教师教育》编辑部等协同举办。会议主题是“教育家精神培育与基础教育强国建设”。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厦门大学等30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我校部分教师、研究生共200余人参加会议。



游旭群校长致辞

在论坛开幕式上,陕西师范大学校长游旭群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教授分别致辞,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李森教授主持了开幕式。游旭群表示,

论坛旨在探讨如何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水平、推进基础教育强国建设等问题，主题着眼服务国家战略、关切教育现实，将为加快推进我国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基础教育整体水平提供思路、凝聚共识，站位高远、恰逢其时。陕西师范大学将始终坚守教师教育主责主业，致力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周洪宇教授致辞

周洪宇院长强调，教育家精神赋予新时代人民教师崇高使命，为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和指明了方向。弘扬和塑造教育家精神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教育界增强共同体意识，广集众智、共谋良策，一起把教育家精神研究好、宣传好和弘扬好。

在大会报告环节，12位全国知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报告。上午，西南大学教育部西南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主任宋乃庆教授以《教育强国背景下科创教育促进创新的思考》为题，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陕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周洪宇以《教育家精神及其培育》为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杨小微教授以《教育家精神与教师的现代人格》为题，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中教授以《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教师教育当何为？》为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薛二勇教授以《基础教育强国建设的政策标准与实现路径》为题，陕西

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李森教授以《基础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师背景与路径》为题，分别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引起与会者的共鸣。



(宋乃庆教授作主题报告)



(周洪宇教授作主题报告)



(杨小微教授作主题报告)



(卢晓中教授作主题报告)



(薛二勇教授作主题报告)



(李森教授作主题报告)



(史秋衡教授作主题报告)



(郝文武教授作主题报告)



(容中逵教授作主题报告)



(王萍教授作主题报告)



(刘瑞儒教授作主题报告)

下午，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与评估研究所所长史秋衡教授以《传统文化与新时代对话：教师品格内涵》为题，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郝文武教授以《深化素质教育应加强对学科能力培养的研究》为题，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容中逵教授以《教育家精神在中小学的体现是尽责——重提中小学教师的责任

问题》为题，河南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教育学院院长王萍教授以《弘扬教育家精神，培养卓越教师》为题，延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刘瑞儒教授以《用红色资源培育教育家精神引领基础教育教师成长的路径探索》为题分别作了主题报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陈鹏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刘来兵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王澍教授分别主持主题报告。



（圆桌论坛（一）现场）



（圆桌论坛（二）现场）

在圆桌论坛阶段，来自四川师范大学、宁夏大学、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等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2名专家学者围绕“教育家精神培育与基础教育强国建设”这一主题进行对话交流，提出了许多关于教育家精神与基础教育强国建设的精彩观点和看法。

在闭幕式上，李森教授、周洪宇教授分别进行了总结发言，高度评价本次研讨会取得的成绩，并提出了未来的期望和要求。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胡金木教授主持了闭幕式。



周洪宇院长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全体教职工工作“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辅导报告”



周洪宇教授作专题报告

3月29日，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田家炳楼905学术报告厅举行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暨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辅导报告会，深入学习贯彻2024年全国两会精神。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党委委员、全体教职工参会，会议由院党委书记陈雪玲主持。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兼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作专题辅导报告，就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教育科技人才部分进行解读。周洪宇教授指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围绕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如何有力推进的相关内容数量多、篇幅大，呈现不少新特点，反映出党中央、国务院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工作的重视达到新高度。周洪宇教授详细解读“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与教育事业发展的紧密联系，并

指出构建高质量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深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是当前教育改革和创新的关键所在。最后，周洪宇教授由习近平总书记 2023 年 5 月 29 日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关于建设教育强国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延伸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是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龙头是高等教育”等重大政策部署，带领全体教职工认真研读学习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所释放的重要教育政策信号。

陈雪玲作总结讲话。她表示，周洪宇教授的辅导报告振奋人心，催人奋进，指导和启发学院全体教职工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引领和推动全国两会精神融入学院的建设发展。她希望学院全体教职工结合自身工作，将全国两会精神贯彻落实到教学、科研和管理中去，以更昂扬的姿态、更坚定的信心、更务实的行动推动学院事业更高质量发展。



我院周洪宇院长受邀参与“八秩荣光 强师报国”陕西师范大学2024年教育博士生论坛

“八秩荣光 强师报国”陕西师范大学2024年教育博士生论坛



4月21日，教育家精神论坛系列活动——“八秩荣光 强师报国”陕西师范大学2024年教育博士生论坛在雁塔校区举行。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受邀出席活动。

此次论坛由陕西师范大学主办，陕西教师发展研究院、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教师教育处、教育学部、文学院、心理学院、教师发展学院、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陕西师范大学）联合承办。论坛以“践行教育家精神与新时代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为主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兼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陕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周洪宇围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释放了哪些重要的教育政策信号？——2024年全国“两会”精神教育科技部分解读》作专题报告。与会的教育博士生在分论坛上围绕教育家精神内涵及实践路径研究、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研究、新课标、新课程、新教材与课堂教学研究等进行分享与交流。论坛共征集124篇学术论文。经评审，共颁发一等奖12项，二等奖20项，三等奖36项。

陕西教师发展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教师教育处及教育博士生培养单位负责人参加了论坛开幕式。陕西省基础教育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及学校教育博士生导师代表、学生300余人参加论坛。

长江教育研究院是在湖北省教育厅的支持下，由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发起，于2006年12月16日成立的教育研究机构。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03-2023），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担任院长。

长江教育研究院本着“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的指导思想，“民间立场、建设态度、专业视野”的立院原则，聚集了一批国内外优质教育专家资源，搭建了一个以文化出版企业为依托、联系相关教育专家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平台，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政策研究为重点、出版企业为依托、政府支持和社会参与为支撑，“学、研、产、政、社”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的新型体制机制。

17多年来，长江教育研究院一直致力于打造新型教育智库“重器”，努力让智库的“谋划”转化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智库的“方案”转化为实际行动，智库的“言论”转化为社会共识，更好地为改革奉献力量。自2016年来，连续三年在中国智库索引评选中社会智库类排名稳扎前三。2017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2017年度中国核心智库”。



联系电话：027-87671389

官方邮箱：cjy2006@cjy.com.cn

官网地址：<http://cjy.com.cn/>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277号湖北教育出版社5楼